

# 三中全会前党的工作重心未能实现向 经济建设转移的原因探析

丁俊萍

党的工作重心是由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决定的。由于各个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不同，党的工作重心也就必然不同。当所面临的形势是民族危机严重、阶级矛盾尖锐时，党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借以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此时，党的工作重心必然要放在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上。当所面临的形势是人民开始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时，党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时，党的工作重心自然应当由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就已经在指导思想，明确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问题。此后，在实际工作中，也逐步开始了这一转变。但是，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先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继而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间还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因此在事实上，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全党来说，尚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期间，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与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几乎是并行的。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任务的革命时期已经完结，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为主要任务的建设时期已经到来。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并从革命的根本目的、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对这一思想作了充分的论述。中共八大据此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制定了一条以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

应该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的，把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中共八大据此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全党在一段时间里也是努力贯彻的。但是，正如人们所知，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党的工作重心确实没有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甚至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客观世界中，一切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一个结果往往由多种原因造成。中国共产党长期未能真正实现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是，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现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今后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以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当时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持有异议，认为不完全、不准确，但对其突出我国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基本国情，强调以主要精力发展生产力的着眼点是充分肯定的，对八大据此作出的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是全力支持的，并在不同场合明确指出，现在中心任务是建设，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

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倘若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毛泽东本人当不会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全党的工作重心必定能比较顺利地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人的认识也是会有反复的。由于1956年东欧一些国家形势的变化，特别是1957年我国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毛泽东感到阶级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重，头脑中本来就没有放松的阶级斗争这根弦愈发绷紧，因而断然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他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依据对国内政治形势错误估量而作出的错误判断，对于我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误导作用，埋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升级的祸根。尽管毛泽东在作出这一错误判断之后，仍然于1958年号召全党把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一度以主要精力亲自抓经济建设，但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下，党的工作重心不可能真正实现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社会主要矛盾与党的主要任务都应当是一致的，而毛泽东此时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与他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正确要求则是背道而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是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而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则必然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下，党内关于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的差别及由此产生的争论，被错误地认定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范围越来越大，“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从党外到党内，从社会上极少数人到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致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局部的阶级斗争已无济于事，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求彻底排除“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于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阶级斗争的地位不断上升，在经过与经济建设平行并进的一段时间后，终于彻底取代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相反，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降到次要地位，让位于向“走资派”夺权、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可见，毛泽东错误地改变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是造成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转移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直接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还有一个深

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从整体上来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观念比较淡薄。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杠杆，是摧毁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上层建筑，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的工具和手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之际，因此对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观点特别重视，而对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却相对忽视，学习、宣传和研究得都不够，印象也不够深。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中曾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可见，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当时毛泽东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情况，大致反映了建党时期绝大多数党员的实际。以后，党忙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对生产力理论问题进行补课。因而，就全党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烈，生产力观念则相对淡薄。这一特点的消极影响，在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已初露端倪，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更显突出。

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一方面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突发事件，习惯于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容易把局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全局的阶级斗争，把大量的非阶级斗争视为阶级斗争，把本来是属于人民内部不同意见和党内正常存在的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且驾轻就熟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以致于陷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怪圈而难以自拔；另一方面，受自古以来我国广大小生产者存在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社会心理影响，可以容忍在物质财富贫乏基础上的“均贫富”，却不能容忍那种与一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因而是难以避免的事实上存在着的不平均和不平等。没有认识到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才能创造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而是急于在生产力仍很落后的情况下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不仅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来对待，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

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等重要论述,也未能时刻铭记在心。虽然在工作顺利时多次强调,但一遇到国内外突发性社会事件时就发生动摇。不是把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综合国力,视为巩固社会主义的根本,而是把动员亿万群众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结果必然把经济建设放在次要地位,以便集中力量去抓长期存在的“尖锐的”、“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重心不可能顺利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可见,生产力观念比较淡薄,是中共八大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未能真正实现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是导致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根本原因。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由于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为期七年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又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幅度提前完成三大改造而国家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主体跟不上两翼”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生产力落后的、“事实上不够格”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整个社会生活。要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更是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象所有制的改造那样,依靠国家政权的权力,采用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的方法短期奏效,而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的过程,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必须贯彻始终,毫不动摇。

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国内外政治形势突变等多方面原因,也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不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深入研究探讨。毛泽东以社会经济生活中还存在资本主义因素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尚未完成为由,以城市资本家还拿定息,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自由市场为由,认为“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仅如此,他还改变了过渡时期的含义,由原来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小

过渡”,变成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大过渡”,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并且指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样一来,阶级斗争自然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尽管毛泽东也曾经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认为我国尚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尽管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中国“一穷二白”,生产力落后,也再三强调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强调经济工作第一,阶级斗争与它平行,要抓革命,促生产,但事实上,贯穿于整个“大过渡”时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压倒“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是导致党的工作背离八大政治路线,偏离经济建设中心,工作重点未能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根本原因。

此外,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提出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使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深为忧虑。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相继发生,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问题看得很严重,头脑中本来就没有完全松弛下来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自然重新绷紧起来。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内外政策的一系列变化,使毛泽东认为“党变修、国变色”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现实危险。加上当时我国周边的紧张局势,以及美国支持下的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态势,均使中共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精神上处于对敌斗争的紧张状态,容易把国内出现的某些问题乃至党内发生的某些争论当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造成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些可以说是影响党的工作重心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国际原因。

总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工作重心未能真正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果更是严重的。深刻汲取这方面的沉痛教训,必须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一心一意地抓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跃上新台阶。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金萍)